

日本重新激活军工复合体危害地区和平

■石宏

瞭望台

今年4月21日,日本完成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,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,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。实际上早在此次修改前,日本就因签署合同向澳大利亚出口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。而在修改后,日本又宣布将加速向菲律宾提供二手阿武隈级护卫舰。这些动向表明,日本原本看似“低调”的军工产业已重新活跃起来,可能成为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推手和帮凶。

罪恶的帮凶

日本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始于幕府末期。1853年,美国佩里舰队迫使日本开国,也让日本领教了西方的坚船利炮。为求自保,德川幕府开始学习西方军工技术,从法、美等国进口机床,建立关口铸铁所、横滨制铁所等早期兵工厂;佐贺、萨摩等藩也紧随其后,引入反射炉和造船技术。

明治维新后,日本政府接管幕府遗产和各藩实业并进行全面改造,东京炮兵工厂、横须贺海军工厂、大阪炮兵工厂等相继成立。值得注意的是,政府将国有企业低价出售给三菱、三井、川崎等私人资本,迅速培育出第一批“军需财阀”。其中,海军装备发展尤为迅速。到1892年,日本海军总吨位达7.2万吨。甲午战争后,日本将勒索而来的白银赔款,大量投入到军工升级之中。

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,将日本军工企业与军国主义捆绑更深,国家的大量资源不断流入军工领域。在此情况下,日本催生出一批规模庞大的军工企业。川崎重工、中岛飞机、丰田、日产、东芝、尼康、立邦……纷纷投入军工生产。这些企业大量生产陆海空武器装备,开足马力满足日本不断膨胀的侵略胃口。

1931年,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;1937年7月7日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日本的大规模侵略战争,给亚太地区,尤其给中国带来空前浩劫。这些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出飞机、坦克、军舰、枪械等装备,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帮凶。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,这一血淋淋的军工机器才暂时偃旗息鼓。然而,大量企业却以各种方式保留了下来。

暗藏的潜力

二战后,受“和平宪法”的约束,日本并未开办官方的军工企业,但其军工产业仍保有相当实力。这一局面的形成,并非源于市场机制的作用,而是

依靠一套由日本政府刻意设计、深度主导的军工体系。从生产准入到采购规则,再到持续的资金投入与技术输血,日本政府打着“专守防卫”的旗号,暗地里打造出一个环环相扣、暗藏潜力的隐性军工产业。

这一体系的重要特征,是日本以“指定采购”替代市场竞争。日本军工产品的订货不经过公开招标,而是由官方直接指定生产厂家。防卫省常与经济产业省联手介入军工市场,将武器研发和生产任务交给少数大企业,再层层分包给众多中小企业。例如,制造一辆坦克需1300家企业协作,而一艘驱逐舰更是需要多达2500家企业协作。

日本防卫省管理局下属的“原价计算部”负责核算装备成本,除计入直接材料费、劳务费、间接经费、加工经费外,还需综合考虑执行难度、采购数量、合同周期等因素,再给予企业适当利润。最终的采购价格,基本以此计算结果为基准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防卫省的指定生产并非始终锁定单一企业,而是轮流由多家企业生产同一类装备。例如,海上自卫队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轮流负责;驱逐舰的建造则连续多年在三菱重工、HHI、三井造船之间轮替。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弱竞争和分散生产,削减了军工生产的集中度,使日本得以维持一批低军工依存度的企业,从而保留了战争潜力的基础。

日本军工体系的运转,离不开政府的持续输血和扶持。尽管日本军工产业的利润率不高,但来自防卫省的订单相对稳定,不受市场波动影响。防卫省有时并不从自卫队的实际需求出发,而是以维持生产线正常运转的最低限度为标准,来确定每年的武器采购数量。例如,海上自卫队定编22艘潜艇,为确保生产线不致关闭,每年固定更新1艘。

除一些无法自我制造的装备外,防卫省一般也不从国外直接采购武器装备成品,而是宁愿多花经费,引进许可证生产或自行研制。这两种做法虽然会使装备单价高于直接进口,但却能维持本国企业生产能力、保留军工人才、积累生产经验。

此外,虽然没有官方军工企业,防卫省却在持续加大参与力度。其下设的技术研究本部专门负责与民间企业合作,共同研制新型武器装备。文部科学省的宇宙航空开发机构,经济产业省的下属官方科研机构,也为民间军工企业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支撑。

三菱重工军工产能不断扩张——

膨胀的野心 恶化的螺旋

■石宏

焦点CT

近日,日本陆上自卫队在“富士综合火力演习”中首次展示了其首款高超音速武器——25式高速滑翔弹,再度撕下了日本“专守防卫”和“被动防御”的伪装。从88式岸基反舰导弹,到25式反舰导弹,再到25式高速滑翔弹,日本防区外打击能力逐步升级,其背后的生产方三菱重工产能不断扩张、技术持续迭代,成为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推手,持续引发关注。

作为三菱集团的子公司,三菱重工的历史可追溯至1884年。彼时,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从日本政府手中租借了工部省长崎造船厂,后又更名为三菱造船株式会社。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,三菱领导层将所属轮船交由政府用于运输兵员补给。战后,三菱获得了日本政府划拨的大量经费,从此进入高速发展期,并彻底与侵略的战争机器完成绑定。

1934年,三菱造船与三菱航空机合并,正式更名为三菱重工。二战期

间,作为日本军工支柱之一,三菱重工为日军提供了包括零式战斗机、各类火炮、航母以及“武藏”号战列舰在内的大量装备,还深度参与资源掠夺、强征劳工等,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。

二战后,三菱重工曾被肢解为3家公司,并被禁止从事军工生产。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局面,美军大量的装备维修与制造订单让肢解后的三菱死灰复燃。1964年,3家公司重新合并,恢复了三菱重工的名号,并再度于日本军工产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在日本政坛,自民党长期执政,许多成员在战时便与三菱重工关系密切。等到其老一代退场后,新一代右翼政客又迅速接替,以政策倾斜和订单分配,换取三菱重工的资金支持,双方利益勾连日益牢固。日本政府规定,对军工产值超过企业总产值10%的企业提供“专项保护”。这一政策几乎是三菱重工量身定制,因为其军工收入恰好略超总收入的10%。

凭借这种政商关系,三菱重工的军品业务如今实现陆、海、空全覆盖,承担日本防卫省约超过30%的订单,2024年

危险的驱动

在这套体系下,日本军工产业长期主要服务于规模相对有限的自卫队,需求并不高。然而,随着日本民品出口下滑,经济增长乏力,相关企业再次将目光投向军工产业,不断游说政府增加相关投资、打破限制武器出口的制度约束。日本政府也顺势加大防卫经费投入,并利用美国战略调整进行政治松绑,在军工生产领域推出一系列扩张举措。

效仿美国提升企业竞争力。以往日本装备研制多采用“指定”方式,虽非单一企业,但极少超过两家,导致企业积极性不足、竞争力弱。近年来,日本政府 and 自卫队开始效仿美国,引入多家企业竞标同一军品、由政府支付定金的模式,并对军工产值超企业总产值10%的企业提供“专项保护”政策。

推动对外出口与合作。当前美西方普遍调高国防开支预算,加大武器采购费用,军售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。为了发掘这一“富矿”,日本推动修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,已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,出口前无需国会提前审批。政府高官也在国际上积极



推销军火,达成多笔订单。日本计划效仿美国对外军售体系,设立独立的国防工业支持机构,由该机构代表企业作为军品出口门面,并为军工初创企业提供资金,推动生产线国有化。日本还不断加强对外合作,与美国联合研发滑翔段拦截弹,与英国和意大利研制第六代战斗机,以提升自身竞争力。

强化对相关企业的控制。2022年底出台的新版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,首次提出“军民一体发展路径”,旨在加强政府、自卫队与民间团体的协作,全面推动军工产业升级。随后,日本政府修订了《武器装备生产开发基本方针》《国防装备和生产的基本政策》等法规,明确核心军工技术专利由防卫省防卫装备厅与民间企业共同持有,防卫装备厅可通过合同形式优先买断。近日有报道称,日本正计划将重点军工企业,特别是弹药生产部门,转为“政府所有、承包商运营”,以保障战时供应链的稳定。

正如二战前的穷兵黩武,日本当下又将经济解困的希望寄托在军事扩张上,日本部分企业也不断推波助澜,企图绑架国家决策、借机攫取利益。可以预见,在巨额防卫费和出口利益的驱动下,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将加速整合成型,与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相互借力。对此,国际社会必须给予高度警惕,坚决遏制日本重启“战争机器”、重走扩张邪路,共同守护战后和平秩序。

图①: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最上级护卫舰。
图②: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为武器出口“松绑”。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评论区

长期以来,日本军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真实地位,被其看似相对有限的营收数字所掩盖。2024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工企业百强榜单上,5家上榜日企合计军售约133亿美元,尚不及美企洛克希德·马丁一家。然而,这种基于账面数字的判断具有相当大的误导性。日本军工的实际分量并不完全显示在榜单上,而是深埋于那些潜藏节点之中。

受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的影响,日本将军工产业的重点放在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领域,试图构筑起令相关国家难以摆脱的依赖关系。西方战机体使用的日本碳纤维、“爱国者”导弹所需的高性能传感器、工厂里不停转动的精密数控机床……这些看似“不显眼的日本制造”,早已深度嵌入西方军工体系的肌体内。

通过这种销售材料、两用元器件和工业母机的“供应商”模式,日本图谋一方面绕过政策壁垒,给军工产业套上和平的外衣;另一方面通过保持技术上的隐性控制力,成为全球军工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,借此提高自身在对外军工合作中的话语权。

在对外合作方面,日美军工合作过去遵循“采购—许可”的单向叙事,日本扮演的是“付费用户”和“高级组装厂”的角色。然而,近年来这一关系正向“联合研产”乃至“反向供给”转变。日本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与美国联合研制导弹、为美军舰战提供维修保障等任务。其中,2025年“爱国者”防空导弹返销美国,创造了二战后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。

当下,日本还越来越多地跳出美国固定的框架,不断扩大合作范围。从与英国、意大利共同推进“全球作战空中计划”并宣布解禁出口,到基于最上级为澳大利亚开发建造11艘新型舰艇,再到积极参加“欧洲无人机”项目……日本正处心积虑地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军工合作中的重要参与方。

日本军工体系蕴含的转化潜力,必须予以高度警惕。20余家大型企业、2000余家中下游企业、上万家配套小微企业——三菱重工同时建造火箭发动机与导弹制导组件,川崎重工同时生产摩托车与潜艇,日本电气的5G基站和雷达……这些企业在民用领域的长期积累,涵盖了现代军工所需的大多关键技术,只需稍加调整便能转入军用跑道。

随着军备需求剧增,美西方开始将目光投向日本,主动激活这一潜在产能。日本也借力打力,将数十年来被和平宪法外壳包裹的制造能力,重新编织成美国主导、辐射澳菲的“印太工业节点”,通过标准互通、技术捆绑和后勤一体化,一步步嵌入同盟作战体系。日本相关企业不再满足于

扩张势头加快 和平底线难存

■语冰

做“防卫省养着的低效作坊”,而是渴望外向发展,成为“被外需订单喂养的显性军火商”。这个自我强化、循环加速的利益链条一旦转动起来,极可能反过来绑架政治,驱使日本在“再军事化”道路上加速狂奔,甚至主动制造冲突。

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,日本突破自身军工出口的制度约束、加码输血军工产能,撬动的不会是其图谋的所谓大国地位,而只会是穷兵黩武后的又一次灾难。

认知小站

“军财抱合”兴风作浪

二战前,日本形成了所谓“军财抱合”体制。三菱、三井、住友、安田等财阀,控制了日本半数以上工业生产,与军部互为表里、彼此喂养。财阀为战争筹措资金,推动军备扩张,又在被占区系统性掠夺资源、强征劳工,将资本增值建立在受害国人民的骸骨之上。然而战后,日本财阀却未被彻底清算,三菱、三井至今仍是日本经济支柱,并在日本此轮军事松绑中不断兴风作浪。

战机合作存在变数

作为对外军工合作的标志性项目,“全球作战空中计划”被日本寄予厚望,意图通过联合研制六代机,摆脱对美依赖、补齐空中短板。然而由于资金紧张、技术路线分歧等原因,该项目推进缓慢、时间一延再延,2035年服役的目标已基本落空。此外有报道称,英国对机载AI等核心数据层层设限、不肯充分共享,也为三方合作蒙上阴影。

关键数据持续造假

去年底,川崎重工承认在1988年至2021年期间,持续篡改潜艇发动机燃油效率等关键检验数据,涉及约66台发动机,且背后还牵出虚报预算、利益输送等问题。对此防卫省却称未对作战行动或安全造成影响。分析认为,日本军工正陷入贵而不实的恶性循环。其根源在于“以民掩军”带来的封闭垄断与监管虚设,这种纵容为造假提供了空间。

版式设计:胡云艳
资料整理:黄体彪 李庆旭